

4月29日,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西南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理论研讨会在西南大学举行。会上,来自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一线工作者以及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朱安东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

当前,我们党正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进程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是按照自己的逻辑相对独立地发展。但在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后,各个国家便不再是孤立发展,而是逐渐或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世界历史。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整个世界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阶段,二是从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阶段向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阶段转变。

在第一个阶段,西方国家利用科技和产业革命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但这一过程也充满了剥削、奴役和压迫,充满了暴力和血腥。西欧国家受二战影响而削弱,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兴起,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领导者。

与此同时,欧洲的殖民体系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解体,新生的民族国家在寻找新的发展模式,以发展本国经济、巩固政治独立地位,实现现代化,而社会主义无疑颇具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统治集团支持其学者发展出了各种现代化理论。这些理论掩盖了西方国家现代化历程中残酷和血腥的一面,构造了一套似是而非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and 道路,并强调所有国家都只能沿着这条共同的、直线的道路向建立现代化国家的方向演进。当然,这套理论也遭到了许多质疑和批评,后来又出现了后现代化理论和第二次现代化理论,以及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现代化模式。这些理论演进不仅在逻辑上错误百出,更在实践中深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带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体现在

在两个方面:一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短短七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成功地实现了站起来和富起来,目前正在强起来的进程中快速前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原则及其成就正在引起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多的关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打破了帝国主义体系,为第三世界国家选择另外一种道路提供了可能和空间。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从而推进了世界历史第二个阶段的伟大进程。

相关研究人员会聚一堂,共同就“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理论难题、经验做法展开交流讨论。本报按发言顺序进行了部分摘编,现集中刊发,与读者共享。

——编者按

重庆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刘嗣方

持续深化对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实践和理论的认识

超大城市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做好城市工作,推动超大城市治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实践要求,为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各超大城市牢记总书记嘱托,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着力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在实践中创新探索,在理论上持续深化认识。

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中国式现代化包括经济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内容。我国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既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也体现了“本质要求”,是不同于西方城市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治理新范式。我国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现代化治理,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城市现代化治理,是以人为核心的城市现代化治

理,是全方位全周期的城市现代化治理。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我国超大城市能够实现现代化治理,根本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彰显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调动各方面资源和力量攻克超大城市治理中的重大难题,不断把党领导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政治优势、理论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强大的治理效能。

重庆初步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特色鲜明的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重庆是我国辖区面积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具有空间规模宏大、行政管理单元多、城乡区域差异大等特点。党的二十大以来,重庆立足市情实际,充分发挥直辖市扁平化管理体制优势,围绕机构设置、实施意见、行动方案、攻坚行动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推动“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和数字重庆三级贯通一体化实战能力建设“双向驱动”“双向赋能”。这一首创性、差别化路径,全面推动重庆治理模式创新和治理体系重构,实现了城市治理的理念、思路、机制、方法全面变革重塑。这一重大创新成果,不仅为城市治理注入强劲动力,也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更加注重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运用“两个结合”推动理论研究,构建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自主知识体系。要通过提炼学理性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命题,将之升华为逻辑严谨、系统全面、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理论。要从人民创造性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概括提炼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从而以新的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新发展。

武汉大学主流意识形态研究院院长、教授 项久雨

关于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的一点思考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局视野,结合重庆发展实际和独特优势,破解“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复合难题,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发、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续写重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应然之举。

重庆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国家中心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肩负着国家战略使命,兼具超大城市转型的典型示范价值。基于对其发展新阶段特征的精准研判,应通过“枢”与“城”战略耦合实现功能重构,以“减量”与“提质”的动态平衡推动发展范式转型,通过“外部协同”与“内部均衡”的立体布局

推动空间整合,从而探索符合超大城市现代化要求的实践路径。具体而言,产业升级是激活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核心引擎,需要在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现代服务业能级中破解“重化工依赖”,在老工业基地转型中蹬出“智造”之路;城乡融合是绘就共同富裕新画卷的关键纽带,需要在区域经济“特色突围”、乡村振兴“数智赋能”、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中破解“二元结构”,在大城市带大农村格局中走出“共富”之路;科技创新是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关键驱动,需要在战略通道“能级跃升”、开放平台“创新突破”、创新生态“协同共生”中破解“内陆瓶颈”,在“不沿边不靠海”区位中间出“开放”之路;生态旅游是彰显山水城市新魅力的鲜明底色,在生态价值“多元转化”、文旅IP“国际表达”

中破解“山水阻隔”,在“两山夹两江”的地貌格局中实现“山水资源”向“发展资本”的有效转化;民生改善是构筑幸福生活新图景的根本标尺,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梯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数字赋能中破解超大城市的“现代化悖论”,在治理创新中构建超大城市善治新范式。

依托“两江环抱、四山纵横”的地理优势,叠加“制造重镇、开放高地”的产业基础,重庆具备构建“新科技+新产业+新生态”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现实基础与战略潜力,在持续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六区一高地”中有效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能,推动城市能级跃升,在破解超大城市现代化难题中提供“重庆路径”,更在整体层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全局贡献具有引领意义的城市样本。

西南大学党委书记 张卫国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的重大价值和推进策略

“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重庆的重要战略支点,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联动“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打造内陆开放新范式。深刻把握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的理论逻辑。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策略中,重庆依托区位优势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一是空间枢纽。重庆处在“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中欧班列构建起三维交通网络,形成贯通东西、连接欧亚的空间拓扑结构,实现内陆与全球市场的空间转换。二是要素枢纽。重庆通过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形成要素磁吸效应,借助自贸区和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构建“跨境金融+数字贸易”新体系,以“硬制造+软服务”推动要素双向循环,发挥双循环连接器作用。三是制度框

纽。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通过“跨省通办”等机制创新,建立“重庆试点—成渝验证—西部推广”三级传导模式,推动制度红利向西部延伸。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的三重价值维度。重庆的战略支点价值已超越传统定位,成为国家战略中兼具纵深支撑与战术突破的关键枢纽。一是战略安全双屏障。重庆作为全国重要工业基地,拥有汽车、电子信息两大支柱产业,已初步形成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同时,重庆也承担着长江上游生态修复与森林碳汇重任。二是区域改革试验田。针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总量大但人均收入与研发投入较低的现状,重庆联合四川探索构建“梯度联动”发展体系,为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大胆改革、锐意创新。三是制度型开放标杆。重庆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首创中欧班列运单物权化、

跨境金融区块链等规则,推动内陆开放从物流通道转向制度创新。

推进战略支点建设的系统性实践路径。构建战略支点需要实施“四链融合”攻坚工程,形成具有重庆辨识度的现代化实践方案。一是创新链全周期突破。依托国家实验室重庆基地开展智能网联汽车等关键技术攻关,在西部(重庆)科学城设立孵化基金和概念验证中心,通过“百名教授进千企”促进产学研融合。二是产业链升级改造。尽快完成规上企业智能化改造,扩建工业互联网平台;链主企业要牵头提升本地配套率,将经开区打造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三是生态链金融创新。要建立长江上游生态产品交易中心,联合川鄂建立跨省水环境补偿机制。四是治理链体系建设。要以党建为核心,以数字化为手段,以法治化为保障,以市场化化为补充,形成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生态转型赋能城市治理的良性循环。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级巡视员 毛邦松

奋力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全面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赋予重庆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两大定位”,是重庆立足西部、服务大局的战略指引,为重庆引领带动西部地区实现更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提供了战略支撑,为我国深化向西向南开放注入了强劲动能。

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一年来,重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两次召开市委全会部署重点任务,全面构建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四梁八柱”,系统谋划“九大关键枢纽”支撑体系。一是链接全球能力实现新跃升。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的567个港口,中欧班列(成渝)52条运行线路覆盖欧亚117个城市节点,江北机场第四跑道、T3B航站楼投运,重庆实现“铁公水空”开放通道全覆盖。二是国际经贸提质增效取得新突破。今年一

季度,全市外贸进出口额达1651.4亿元、同比增长4.1%,高于全国2.8个百分点,在渝世界500强企业累计达322家。三是产业创新发展取得新成效。2024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95.32万辆、同比增长90.5%,笔电产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1。优化产业开放创新生态,取得赛力斯“魔方平台”、卫星互联网射频芯片等一批重大关键技术创新成果。四是资源要素集聚辐射能力迈上新台阶。打造国家“西电东送”能源配置枢纽,推动疆电等外电入渝。提速建设西部算力调度中心,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重庆)建设。加快建设西部金融中心,高标准打造西部人才中心。五是制度型开放和国际交往打开新局面。积极探索陆上贸易新规则,持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推广应用,累计签发铁路提单、铁路联运提单约3.1万票。持续提升服务国家总体外交能力,获批在渝设立领事机构累计15家、居全国第4。

奋力开创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新局面。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重庆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重点推进以下工作。一是加快构建现代化集疏运体系,强化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功能,打造联结长江黄金水道、中欧班列、“丝路海运”和“空中丝绸之路”的开放通道体系。二是持续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快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全球集散分拨中心建设。三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对标RCE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服务业等领域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四是打造西部国际交往新前沿,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推动墨西哥、越南驻渝总领馆落地开馆,提升重大国际展会、赛事等活动能级。

重庆工商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任毅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指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重庆、四川两地要紧密合作,不断提升发展能级,共同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产业维度上的集中体现,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和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对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具有重要意义。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实施五年来,川渝两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了阶段性、结构性、系统性的重大成效,产业体系能级持续跃升、现代化产业格局初具规模、区域协同动能显著增强。川渝两地共谋共建,绘制了18条重点产业链图谱,围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特色消费品四大方向,打造了4个万亿级现代

产业集群。聚焦关键领域,构建了“上下游互动、左右岸协同”的跨区域产业协同体系,形成了跨区域产业联盟,深度融合了锂电池、先进材料、生物医药和新型储能等产业链,显著提升了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协同效应,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面向“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川渝两地应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制度支撑,统筹推进产业协同、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基础设施和机制保障五大任务,加快构建结构优化、协同高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一是强化产业协同联动,构建现代化产业集群体系。健全跨区域产业协同机制,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统筹布局,推动重点产业集群错位发展,着力补齐产业链短板,提升整体配套能力。二是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激活科技创新引擎。强化战略科技力

量布局,做强西部(重庆)科学城与西部(成都)科学城“双核联动”,协同打造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前沿交叉研究平台,提升原始创新策源能力。三是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筑牢生态产业支撑带。培育绿色新兴产业,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资源循环利用等产业,建设绿色低碳技术孵化中心和绿色产业示范区,加快打造绿色制造创新引擎。四是完善基础设施体系,提升产业承载与流通能力。加快交通枢纽体系建设,统筹推进成渝中线高铁、成达万高铁、川渝高速公路一体化项目。加快建设成渝两地“大数据走廊”和“东数西算”枢纽节点,提升产业链数字化协同能力。五是创新产业协同机制,打造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持续推进成渝地区制度型开放,深化“川渝通办”改革,打通企业注册、税务申报等事项跨区域办理通道,提升市场主体经营便捷度。

沈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这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指明了方向,为促进数字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在数字空间实现文化传承与发展,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光彩与价值。

数字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代赓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累积了数量庞大、类别多样的璀璨文化资源。但许多历史久远的文物古拙、文献典籍等,由于被风化、腐蚀、虫蛀等而遭到破坏,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则可以使已经残缺不全或不便长期以实物形态展示的文物得以重现,还可借助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让祖先留下的遗产、博物馆里收藏的文物、古籍里的文字,以视频、音频等形式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让

数字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

超越历史乃至国界的优秀文化资源“活起来”。即使是已经损坏的文物,也可以通过先进的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技术、三维建模技术和智能分析技术等,精确记录其每一个细节并进行虚拟修复保存,使其重新焕发光彩和生机,助力人们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历史、身临其境感受其独特魅力。同时,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文化遺產的数字化保护和重建不断开创新局面。如在甲骨文研究中,“数字化、数据化、智能化”大数据平台(“殷契文渊”甲骨文大数据平台)被开发应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可对甲骨碎片进行自动识别,数字化全信息数据模型实现了通过构建数字空间的高保真还原和保护,为甲骨文赋予永恒的“生命”。

数字助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数字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遇,必将丰富文化存储介质和载体,革新文化呈现样态与形式,拓展文化传播渠道与空间,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具有时代价值、符合时代需求、富有时代内涵的文化样态。数字时代可通过构建数字档案、搭建数字资源平台、建立文字音频影像数据库,实现数字化、可视化、远程化、便捷化、

长久性存储。借助互联网,不仅可以全方位、多视角立体展现昔日风貌,还可以降低文物交换流通的频率,减少损耗、保护原貌。数字遗产让许多沉睡多年的历史文物和濒危的珍贵资源拥有了数字形态,使其更加多姿多彩和生动直观。如在博物馆里,经过虚拟空间等数字技术的改进,文化遺產展陈方式得到优化,逼真的三维虚拟场景强化了观众的参与感和互动性,拉近了人们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距离。在网络空间,“云上博物馆”逐渐兴起,用图片、视频、动画等形式多维度展示馆藏文物精品,分享文物背后的精彩故事,深化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而以短视频、网络直播等为代表的移动社交媒体平台的迅速崛起,更是改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由单向输出转为双向互动,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人人都可以将接收到的文化信息进行二次转发或加工传播。这些数字文化产品,极大地提升了可访问性和可传播性、拓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速度、效度和广度,满足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样化需求。

数字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遇见”数字化浪潮,催生出新的文化业态,彰显更强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凝聚力。一是创造更有生命力的新型文化成果。要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进文化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打造网络文学、数字电影、数字音乐、影视节目、短视频等类型多样的数字文化产品,让更多具有永恒魅力的文化资源开出时代之花、结出数字之果。要依靠人民群众力量,强化大众创作的主体意识、内容创新的时代意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未来意识,尤其要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文艺界开展产学研合作,拓展数字文化发展空间。要坚持质量导向多出精品,完善高质量文化成果产出机制,提升数字文化、网络文化等产品的生产和服务供给质量。二是发展更有感召力的新型文化业态。要运用数字技术打造不拘一格的智能化、多元化产品形态和文化业态,如打造“数字+”文化产品,将数字技术与旅游、教育、娱乐、传媒等行业深度融合,推动“云旅游”“智教育”“云阅读”“云展览”“数字博物馆”等新型文化业态发展;打造“文化资源+”模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技术、新媒介、新手段

相结合,丰富文化体验;打造数实结合的文创产业,将数字技术融入文化产品生产全过程全链条,不断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解锁方式”“打开方式”,使文化创新“实体化”,使文字中的故事、遗迹中的文化“场景化”,打通产品与服务、现实与虚拟的界限;打造“体验式”文化消费,通过互动设计、场景塑造等手段,发展互动视频、沉浸式视频、云游戏等新业态,提供特定的艺术氛围和文化体验。三是构筑更有凝聚力的网上精神家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促进优质网络文化产品生产传播,共同建设网上精神家园,为推动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文化支撑。

(作者系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思政课研究专项:24VSSZ050阶段性成果)



扫码关注!《重庆日报·思想周刊》理论信息服务栏目——“理论拾光”,蒸馏政策资讯、打捞理论热点,进行政策解读、发布理论选题,获取最新资讯、参与互动讨论。